

建国后 17年中国高等教育 发展评价与启示

陈武元 洪真裁

摘要: 本文介绍了建国后 17年内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评价了这一时期高等教育改革的得与失,并结合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就尊重教育规律、教育优先发展、高等教育大众化下的教育质量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等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

关键词: 建国后 17年; 高等教育; 评价; 启示

中图分类号: G 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1569(2007) 03- 0150- 06

一、建国后 17年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

建国后 17年的教育是指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前的这一时期,即 1949—1966年,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转型期,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一)两个阶段的划分

关于建国后 17年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论述,目前一般按照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标准把这一时期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接收改造时期(1949—1956年),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高等教育也跟着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第二阶段为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7—1966年)^①。也有学者对此进一步细分,认为第一阶段(1949—1956年)是依照前苏联模式进行的改革,可分成两个时期,即 1949年至 1952年院校调整前的准备时期和 1952年院校调整至 1956年的改革实施时期;第二阶段(1957—1966年)是以偏离前苏联模式为主要特征,也分成两个时期,即 1957年至 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时期和 1961年至 1965年的“调整、整顿”时期^②。

两个阶段的划分方法基本符合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也基本反映了当时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状况和总体态势。在这里,本文认为,许多数据(详见表 1和表 2)表明,1956年并不是这一时期中国高等教育两个阶段划分的严格界限,1958年开始的“教育大革命”是一个重要标志,这也充分说明了教育对外部环境因素变化的“滞后”反映。

(二)曲折的发展过程

1 第一阶段(1949—1956年)以全国性的院校调整、改革学制以及改革课程内容与教学方

作者简介:陈武元,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

洪真裁,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式为主要内容。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全面接收和改造各种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全面学习前苏联,改革现有学制,推进课程改革,进行教师思想改造,任免一批大学校长,吸收工农干部和工农青年进高等学校,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同时,为了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和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仿照前苏联模式,以培养工业建设干部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进行全国性的院校调整。

在经过1950年酝酿和1951年试点后,1952年5月,教育部制定了《全国高等院校调整计划草案》,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全面展开,按大学、专门学院及专科学校三类分别调整充实,重点从原有大学中调整、归类、合并出新的工业院校和师范院校,同时还分离出农林、医学医药、财经、政法、艺术、体育等专门院校,综合性大学实际上只是文理综合院校。经过调整,1953年,全国高等学校剩下182所,其中综合性大学14所,工业院校38所,师范院校31所,农林院校29所,医药院校29所,财经院校6所,政法院校4所,语文院校8所,艺术院校15所,体育院校4所,少数民族院校4所,其他院校1所^③。1955年以后,由于当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国家从地域布局上又进行了部分院校调整,主要是把一些沿海和大城市的高校全部或部分迁往内地,同时加强原有内地高校的建设。

这一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各项指标在稳定中发展,全国高校数在1949年到1956年间一直维持在200所左右,在校生数从1949年的11.71万人增加到1956年的40.8万人,专任教师数也从1949年的1.6万人增加到1956年的5.8万人(见表1)。

表1 1949—1956年高等教育发展状况

单位:所、人

年份	高校数	专任教师数	在校生数	
			本专科生	研究生
1949	205	16059	116504	629
1950	193	17319	137470	1261
1951	206	22960	153402	2168
1952	201	27089	191147	2763
1953	181	33630	207932	4249
1954	188	38835	252978	4753
1955	194	42066	287653	4822
1956	227	58346	403176	4841

注:根据刘光主编:《新中国高等教育大事记》,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出版的数据整理而成。

2 第二阶段(1957—1966年)主要以“教育大革命”和教育调整为主要内容。

1958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以及各项事业的稳定发展,由于对形势的错误判断,中国大地出现了大跃进、大炼钢铁、胡夸风、共产风等冒进行为。高等教育领域也不例外,全国各地出现大办高校的热潮,特别是部门办高校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全国高校的数量和在校生的规模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见表2)。1959年至1961年间,中国遭遇建国以来最大的经济困难,社会各项事业均受到比较大的影响,高等教育也受到很大的冲击。

表 2 1957—1966 年高等教育发展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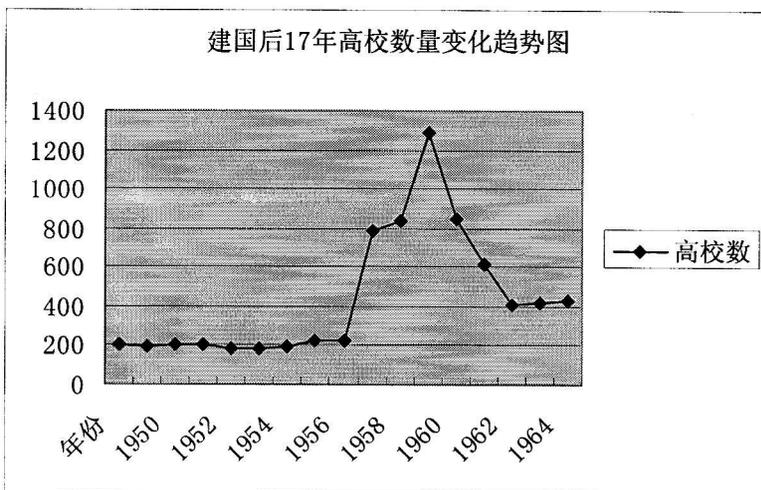
单位: 所、人

年份	高校数	专任教师数	在校生数	
			本专科生	研究生
1957	229	—	441000	3178
1958	791	84993	659627	1635
1959	841	99657	811947	2171
1960	1289	139142	961623	3635
1961	845	158736	947166	6009
1962	610	—	830000	—
1963	407	137925	750118	4938
1964	419	135176	685314	4881
1965	434	138116	674436	—
1966	—	—	533766	—

注: 根据刘光主编:《新中国高等教育大事记》,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年版数据整理而成。

1961年以后, 高等教育领域全面贯彻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采取“定、缩、并、迁、放、停”^④等措施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整顿。1961年3月, 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 从教学工作、生产劳动、研究生培养工作、科学研究工作、教师和学生、物质设备和生活管理、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制度和行政组织、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等十个方面对高等学校的教学和管理进行了规范。之后, 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和社会各项事业的稳定, 经过调整后的高等教育逐步走上正常轨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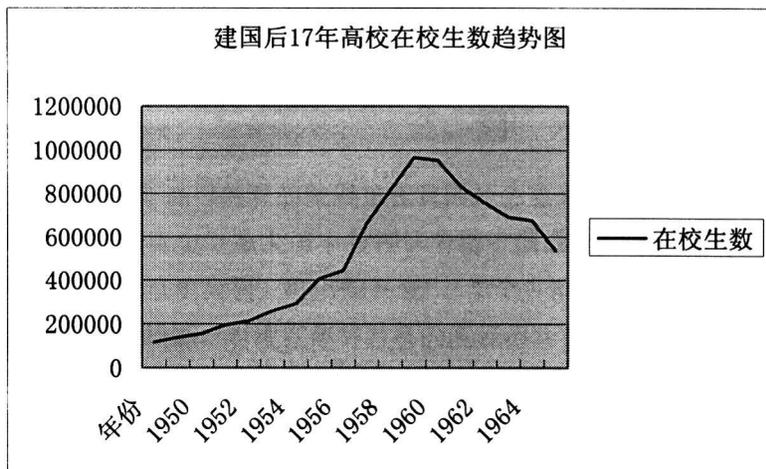
图 1 1949—1965 年高校数变化趋势图



这一时期, 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呈现出一种大起大落的变化趋势, 全国高校数从 1957 年的 229 所增加到 1960 年的 1289 所, 短短的四年内急剧增加了 463%, 后来又急剧降到 1963 年

的407所,三年内全国高校数缩减了三分之二,高校在校生的数量也大致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变化趋势(详见图1和图2)。可以说,高等教育的这种不规则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政府和百姓对高等教育发展的迫切愿望,但是这种违背教育规律的做法最终不仅没有达到人们预期的目的,反而给高等教育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图2 1949—1965年高校在校生数(含研究生)变化趋势图



二、建国后 17年高等教育发展的特点与评价

(一)特点

建国后 17年内,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探索的过程而同步发展的,是高等教育适应社会变革的重要过程。这一时期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主要围绕着接收与改造、院校调整、“教育大革命”以及后来的教育调整等重大改革内容展开的,改革前期主要以前苏联的高等教育为样板,而后又在比较前苏联教育体制和探索有中国自身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不断发展,教育外部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高等教育内部诸因素的影响比较显著,高等教育的改革充满了困难和艰辛,不过也基本维持高等教育在曲折中的一种发展态势,奠定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基础。

(二)评价

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建国后 17年的高等教育有着一种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它所积累的一些经验和部分改革的措施对当今中国高等教育还有着重要的影响:(1)1952—1953年的院校调整,适应我国当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国家在建国初期进行的工业化和国防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2)这一时期高等教育所保存下来的人才、技术和物质力量为我国在“文革”后能够迅速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保障^⑤,使得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不至于在建国初至文革后近“一代人”的时间里出现太多的空白;(3)由于原有高等教育的基础和新制度变革对广大高校教师积极性的调动,这一时期我国高校教学和科研也有着不同程度的发展,如北京大学等单位研究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项目在当时就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另一方面,建国后 17年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措施也给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了许多负面效应:(1)建国初期对高等学校的接收和改造中,取消私立高等教育(主要

是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 实行高度集中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 限制了高校办学自主权, 使我国高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缺乏应有的竞争机制, 出现了高校分工不清、“千校一面”的现象, 阻碍了高等教育多样化发展。(2) 1952—1953 年的院校调整形成了综合性大学、专门学院等格局维持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大学格局, 至今仍对我国高校有较大的影响。首先, 这一时期的院校调整政策直接削弱了我国原有一些重点大学的综合实力, 使得我国一些顶尖大学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其次, 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 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出现了综合化的趋势, 学科之间的界限逐步模糊, 学科交叉以及由此产生的新兴学科成为新学科催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单一专门学院的格局明显不适应这种潮流和变化, 违背了学科发展的规律。

三、启示

建国后 17 年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高等教育的一次重大尝试, 日本著名中国教育史专家大塚丰教授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高等教育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形成时期^⑥。“以史为鉴, 可以知兴衰”,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这一阶段过程中改革与发展无论是成功或者缺憾, 对现在高等教育的发展都具有借鉴意义。

1 高等教育的发展要尊重教育规律, 在教育规律的指导下来发展高等教育, 同时在高等教育的实践和发展过程中发现并运用新的教育规律, 促进高等教育健康稳定的发展。

潘懋元教授指出, 教育受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所制约, 并为之服务。与此同时, 教育的内部关系规律和外部关系规律的关系是相互起作用的, 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要通过内部关系规律来实现^⑦。社会政治变革引发教育领域改革, 这是建国后 17 年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要原因。但是, 教育的发展有其本身内部的特殊规律, 无视教育规律的存在, 简单的人为方式或盲目的政治热情对教育都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建国初期高等教育发展的挫折与困难与此不无关系。

根据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三个阶段理论, 当前我国刚处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初始阶段, 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 也是一个各种矛盾凸显的时期, 大众化教育与精英教育、人口高峰与大学生就业难、高校规模扩张与高校办学资源短缺等矛盾和问题形成了许多两难选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应该在坚持高等教育办学规律的前提下, 在新的实践中不断探索高等教育的新规律, 探索多样化、多层次的高等教育办学体制, 加快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 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日益增长的需求。

2 尊重历史, 面对现实, 对高等教育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要把教育摆在一个优先发展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之初, 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 对教育的特殊规律和重要地位认识不足, 教育的发展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同时, 因为新旧社会制度的严重对立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影响, 教育过分强调为政治服务而走向了单一化发展的道路。另一方面, 这一时期, 社会对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也认识不清, 教育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甚至于后来“文革”期间撤销了国家教育部。

教育是一个全局性、战略性的国家责任, 关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把教育摆在一个优先发展的地位。目前, 国内外高等教育竞争日趋激烈, 综合性、研究型、信息化、开放式办学已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流。要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的理念, 推动高等教育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衔接, 推进国家创新, 提升民族力量。

3 当前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要贯彻适度超前的发展战略,确保数量和质量同步发展,保证我国高等教育健康、有序发展。

2003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2005年底,我国高等教育总规模超过23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1%^①,中国已经成为高等教育体量最大的国家之一,并已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阶段,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虽说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教育大革命”,但是规模扩张也给高等教育带来诸如教育质量下降和学生结构性失业等新问题。目前中国高等教育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由数量增长带来的师资以及其他教育资源不足引起的^②。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该对高等教育加以宏观调控和引导,社会各界以及高校本身也应该正视这些问题,尽力避免建国初期高等教育发展出现“教育大革命”时期大起大落的现象。高等教育在大众化发展阶段的质量提高,需要国家落实政策和资金保障,社会力量办学积极参与,高校努力引进、培养师资并完善办学条件等多方面共同努力。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应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将高等教育的数量发展同一定的办学条件相适应,推动高等教育“外延式发展”战略^③,实现高等教育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4 保持清醒的头脑,循序渐进,发展特色,突出优势,确保重点,扎实推进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国家科学、文化和教育发展水平的标志。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增强国际竞争力,就必须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务院在《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了“继续实施‘985工程’,努力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奋斗目标。与此同时,国内许多有条件的大学在新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中也都明确标出了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或高水平大学的时间表。

在当前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的征程上,一方面要记住建国初期“教育大革命”的急于冒进的教训,反对盲目扩张和不切实际的口号,另一方面,又要力戒盲目地学习外国的经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重在积累和选择性的突破,应该立足中国的实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或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大学。

注释:

- ① 余立主编:《中国高等教育史》(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85页。
- ② 潘懋元主编:《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3-74页。
- ③ 刘光主编:《新中国高等教育大事记》,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7-59页。
- ④⑤ 吴玉文:《建国40年教育事业的回顾与思考》,《河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1期。
- ⑥ 大塚丰著、黄福涛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形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 ⑦ 潘懋元:《高等教育:历史、现实与未来》,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139页。
- ⑧ <http://www.cem.ecnu.edu.cn>(中国教育科研计算机网),2006-07-06。
- ⑨ 潘懋元:《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战略》,《中国大学教学》2004年第1期。
- ⑩ 邬大光:《我国高等教育应走外延式发展道路》,《求是》2003年第10期。